

經濟

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在中國與各葡語國家的關係中所擔當的角色*

*Luísa Bragança Jalles***

引言

1979年，鄧小平開始在中國實施經濟開放及現代化政策。二十年後，澳門的主權將移交。

最近於1997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在中國該政策基本保持不變。對上一次，於4月份召開的第九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新當選的總理朱鎔基再次肯定了該意願，並在會上介紹了未來五年經濟改革的目標計劃。

中國隨着其經濟在世界佔一席位，因此不會忽略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對中國來說，任何一個國家不僅意味着是其在國際組織中的一個同盟國，而且更是其龐大的產品和勞務的市場，以及是中國繼續發展經濟現代化所需財物和勞務的有力提供者。

所以，不妨在此剖析一下與各葡語國家的未來關係。無疑，中國本身會與各國發展直接關係。然而，澳門所擔當的有利該等關係的角色的有關問題亦值得探討。

基於這種情形，是否中國愈對外開放，澳門所扮演的角色便愈重要呢？

澳門是否能夠憑藉那些直至目前為止尚未或甚少被利用的潛能而取得成果呢？

無可否認，中國與各葡語國家間密切的商貿關係會為澳門在過去從未有過的廣泛的活動中提供開發潛力的機遇。然而，這將會是一項長遠的互補策略，雖然短期內香港、中國(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愈來愈發達的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對澳門最具影響力。

* 本文改自1998年6月28日至30日在澳門大學舉行的《第三屆葡語經濟學家研討會》上所作的報告。

** 經濟學家、澳門經濟司顧問培訓員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的觀點，並不代表澳門政府的立場。

一、澳門 —— 目前的經濟狀況 —— 與香港和中國， 尤其是廣東地區相互依存

在過往的三十年，澳門的經濟發展一直依靠兩個主要行業——出口業和旅遊業，其中尤以旅遊業中的博彩業最為突出。直至八十年代，金融和地產等其他行業開始崛起。

這種發展在與鄰埠香港以及近期與廣東地區的密切關係中體現出來。因此，這種較突出的互相依賴的經濟關係中的某些方面值得我們去探討。

1. 與香港的經濟合作

無論是始於六十年代末期的澳門紡織品出口工業，抑或是七十年代非紡織品的製造和出口多元化，都是由於香港的企業在產品輸往國際市場時，受到外部和內部的限制而將生產工序轉移所致。

因此，為了要面對於1962年至1973年實施的《長短期協約》（Short and Long Term Arrangements on Cotton Textiles）對香港棉織品出口的數額限制，以及隨後1974年的《多纖協約》（AMF）擴展至對人造纖維、羊毛成衣以及針織產品的出口數額限制，香港的一些企業家便把部分甚至全部生產轉移來澳。

香港工業在澳門覓得了較有利的生存條件¹，其中包括一個行政干預有限的自由經濟體系，這對於打入外國市場相對有利。此外還有高度靈活的尤其是非專業勞動力的提供，廉價的工資，以及一個充滿活力和能夠承擔風險的企業家核心（Feitor, 1991）。

雖然三十年代就已在澳門開設了第一批紡織廠，但到了五十年代末，由於難以向它們大部分產品的輸出地中國繼續出口，一些紡織廠被迫只好轉型，於是本澳便出現了首批製衣廠。數年之後，香港的商家們亦加入了這個本地企業家的小核心。

在這裏我們暫且打斷話題，憶述一下五十年代末期的情況。正如澳門《華僑報》刊登的一份研究（黃漢強，1988）中揭示：“當葡萄牙官兵返國或被調往非洲時，他們所帶的一些澳門製造的成衣，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注意。”結果，葡萄牙、安哥拉或莫桑比克的一些入口商開始發來成衣訂單，因此，直到1960年，澳門的出口產品48%是輸往當時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地市場，這些出口產品以成衣為主，其次是炮竹及神香等傳統製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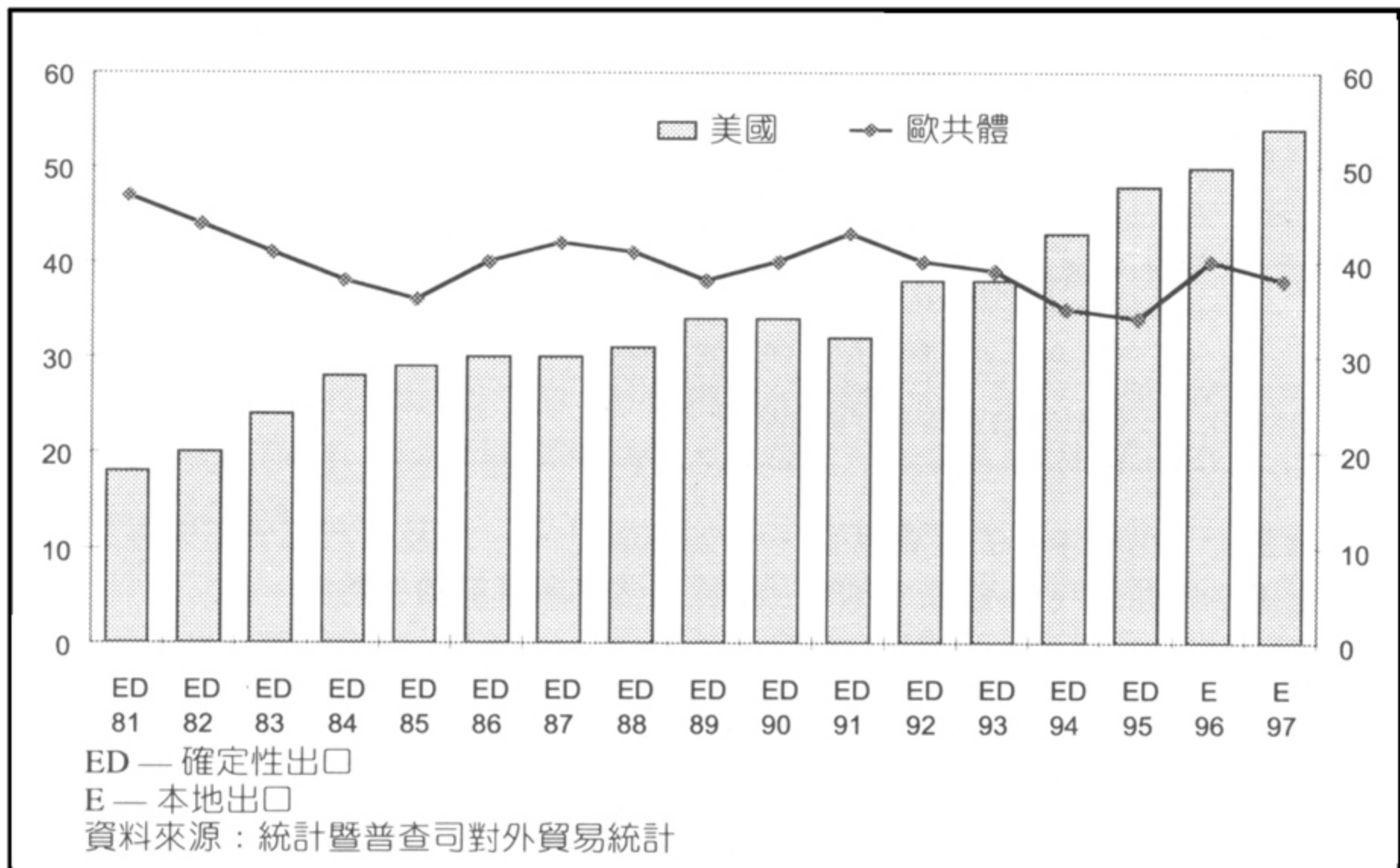
1974年4月25日之後，（尤其是非洲的葡萄牙屬地獨立不久，澳門實際上失去了安哥拉及莫桑比克的非洲主要出口市場），由於葡萄牙的發展以及其他因素，

1. 國際經濟局勢對澳門出口業的發展十分有利。一方面，發達國家開始加強發展利用科技、專業人才和資本的工業，並准許從其他國家輸入非專業性工作的產品。另一方面，澳門亦有利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繼續着重推行替代入口政策的工業發展策略。

再加上尤其是與美國和歐共體所簽訂的《多纖協約》² 中的首批雙邊紡織品協議於七十年代中期之前開始生效，便徹底改變了這種情況。

美國和歐共體這兩個市場很快便轉而吸納澳門的大部分紡織及成衣製品，這情況一直維持至今。1997年，這些貨品的本地出口幾乎全部（92%）都是輸往這兩個市場，其中美國佔54%，歐盟佔38%。

圖表一（1981-97）澳門紡織品及成衣輸往歐共體和美國的百分比



八十年代前期，新興的出口工業開始湧現，今次是非紡織產品（如玩具、人造花、陶瓷等），這是因為香港的企業投資面對第二次浪潮，其成因一方面是由於香港逐漸人手短缺和租金上升，另一方面是由於香港外銷這類產品再不享有豁免或減低關稅的普遍優惠制（SGP）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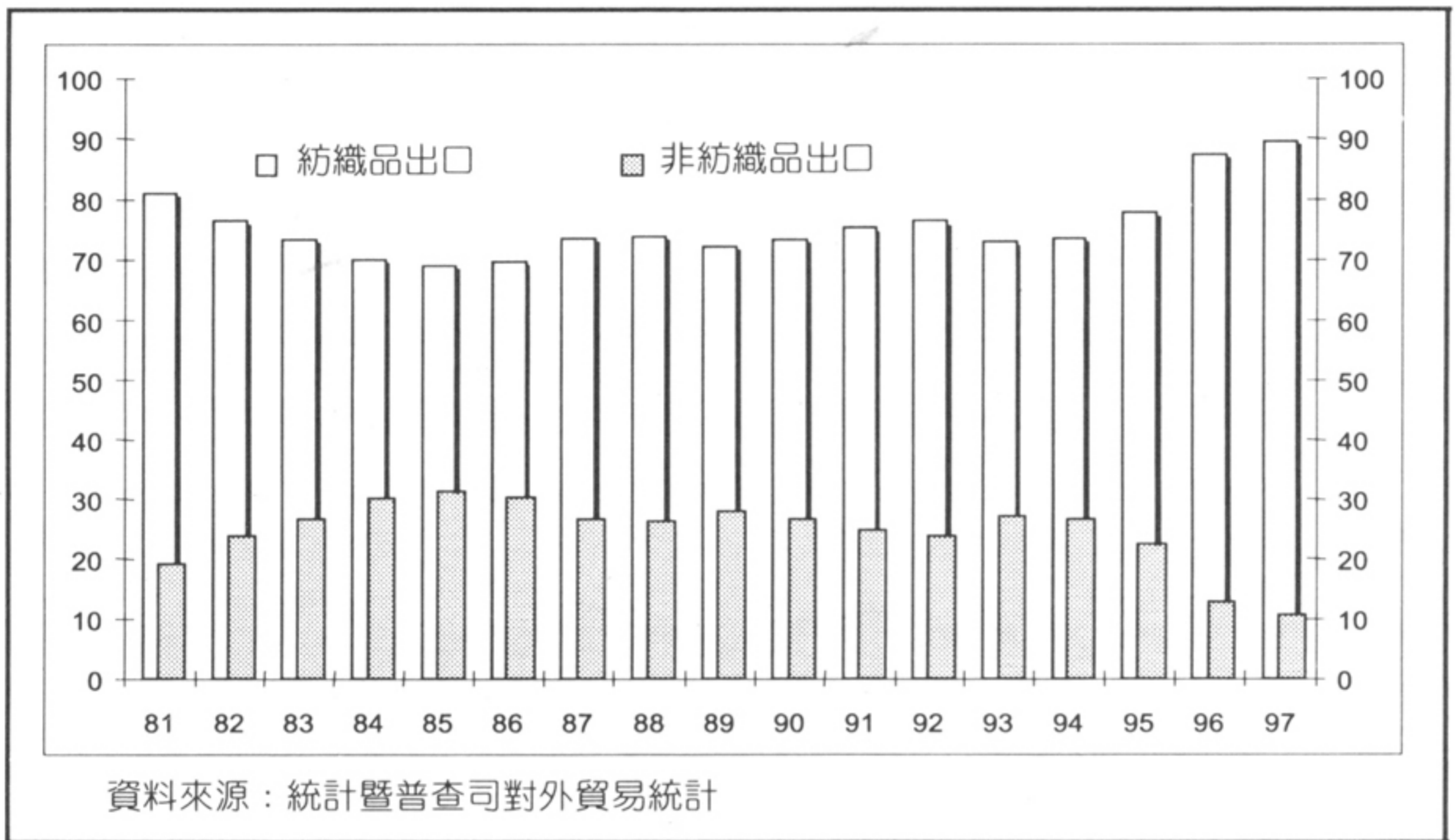
1981年非紡織品出口祇佔澳門貨物出口的19%³，1985年迅速增至31%這個最高水平，但自此便開始走下坡⁴。1997年非紡織品出口祇佔澳門本地出口的10%，目前是以鞋類、電動及電子消費品為主。

2. 根據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商權的雙邊協議，雖然事前已知道對澳門出口到法國、英國、愛爾蘭、瑞士及美國等地的一些紡織品有條件限制，但無須訂定實施限制澳門紡織品出口的首要條件的日期，亦無須訂定該等工廠運作時必須遵守的條件。

3. 不可直接以1995年之前的出口數據與1996年及續後數年的數據作比較。首先，所記錄的確定出口（不會返回澳門的出口貨物）的數據，除了國內出口外，還包括一部分再出口貨品。自1996年起，已可以區分國內出口或再出口貨品。

4. 1986年澳門的確定出口中玩具業約佔至12%，僅為1997年澳門國內出口的0.6%。

圖表二（1981-97）澳門出口產品結構比例



事實上，由於中國的經濟改革——如下所見——以及西方部分主要國家給予中國最優惠國待遇（NMF），澳門工業多元化時期祇持續了數年。

但是，澳門與香港相互依存，不僅祇限於工業，服務業亦十分重要，這是博彩業增強的原因。這一行業已存於澳門一個世紀以上，自六十年代開始便成為推動本地區經濟的主要的行業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現時專營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在1962年第一次取得博彩專營權時，即時採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引進水翼船將澳門與香港連繫起來。來往兩地所需時間由四個小時縮短至一個半小時，使為博彩所吸引的香港旅客人數激增，因而更促進了酒店業的發展。

澳門與香港息息相關，這一點可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各式各樣的投資、每逢周末數以千計來澳博彩的旅客、香港在澳門出入口市場佔有一定的地位、澳門幣與港幣的緊密連繫以及澳門長期仰助於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商業中心和港口之一所提供的便利。

與此同時，博彩業成為本地公共開支的融資來源亦是十分重要的。自八十年代中期，它為本地區的電訊、電力、自來水以及基本衛生等方面的基建帶來了明顯的改善。

2. 與中國，特別是廣東地區的經濟合作

亦是始於八十年代，澳門除了與香港有牢固的經濟關係外，由於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和開放政策，澳門亦逐漸和中國尤其是廣東地區開始經濟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由於在一段較長時期（1949 - 1978）置身於現代科技之外，因此若祇靠自己沒有外來投資，中國的經濟未必可以迅速達到國際水平。

為此，中國當局按照上述的經濟開放和現代化政策，於1979年審慎地吸取了所謂“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s)及“出口加工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的經驗，即是這些地區的企業可以輸入製造出口物品的原料而無須繳付較高的關稅。

這些經驗，很多東方和東南亞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要增加其出口量均試行過，於是便成為了中國設立“經濟特區”⁵構想的根源，即以一切優勢提供就業機會，使之成為試驗新科技和實際管理的中心以及創匯的地方。

因此，1980年8月正式在廣東省成立了深圳、珠海和汕頭首三個經濟特區。此後不久，又在福建成立了廈門經濟特區。

地域結構的特徵和中國人對現代化的冀求，使沿海地區成為中國迅速發展最穩健的地方。經濟中心可能出現在太平洋地區得到了認同，再加上“第三次浪潮”(工業及科技革命)從四面八方衝擊而來，使太平洋沿岸成為中國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由於特別意識到須靠近工業、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因此，中央政府謹慎地在沿海地區選出深圳、珠海和廈門等地區，並使其享有優惠，同時更與香港、澳門和台灣互相競爭。

除此之外，由於廣東省和福建省是大多數華僑的故鄉，因此特別吸引這些投資者。他們有機會參與祖國的建設，同時更可透過投資獲利。這對很多富裕的華僑來說是一種既富有情感更具有實用性的召喚，漢語詞典中稱他們為“愛國資本家”

總而言之，中央政府對首批經濟特區的成立及選址，應該是經過了深思熟慮，考慮到經濟和地理的因素，更顧及中國統一的政治因素。

中央政府選擇在毗鄰澳門邊境的沉寂的珠海漁村設立經濟特區並不是偶然之事。他們希望在很大程度上珠海的發展能夠倚仗澳門的資源，這一點，在珠海經濟特區成立之初的確成為了事實。

實際上，自北京宣佈了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來，澳門的企業家便成為了接壤區域的投資泉源。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旅遊業第一個合資項目便是利用澳門的資本：這就是1980年10月開業的珠海石景山旅遊中心(Shum, K.K. 和 Sigel, L.T., 1986)。

值得注意的是，各經濟特區最先吸引較多投資的其中一個項目就是旅遊業，確切地說因為這是一種勞動密集型行業，可以提供高邊際利潤，且能於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收回成本。

這種投資方式，由於不用中央政府和廣東省地方政府注入大量的資金，因此特別為中國當局以及香港和澳門的投資者所歡迎。這些投資者祇要初始在該行業投入資金，便可以很好地感受經濟特區的投資氣氛。

5. 有關經濟特色及經濟特區的目標，本文摘錄了《澳門與珠江三角洲經濟整合過程》中的某些內容。該文章由經濟司司長所著，並於1992年6月3日在 Palácio de Queluz 舉行的題為《澳門在珠江三角洲的使命與機會》葡國的研討會上發表，刊登在1993年《行政》雜誌第二十一期的第479頁至487頁內。

隨着時間的流逝，儘管珠海的發展與澳門的發展模式保持着某些相似之處，但仍有一段差距，很明顯這是因為珠海⁶沒有博彩業，難以重現澳門旅遊業的成就（Vogel, 1989）。

然而，事實上珠海一開始便已計劃設立工業區，因此，當一些有關基建逐漸完成且清楚地意識到旅遊業不會產生預期的收益時，地方政府於是便將注意力重投到工業發展方面，推廣吸引投資的政策，不單吸引澳門的投資，還包括香港的投資，嘗試在這方面效仿深圳的例子。

與此同時，中國的投資和現代化開放政策並未停留在上述四個經濟特區內。當然，這些特區所取得的如此驕人的成績，使其他的措施亦很快地被引入，特別是1984年，又開放了十四個沿海的重要城市⁷以吸引外資，其中包括廣東省省會廣州。1985年，正式劃定了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同樣為外資提供優惠條件，1988年4月，成立了第五個經濟特區——海南島。

雖然初期吸引外資的目標並未如預期般理想，因為西方企業仍然抗拒在廣東或中國的其他地區投資，他們對招聘和解僱工人、資金返國是否方便還存有懷疑，還有如何避免不必要的開支以及如何解決因中國居民不履行合約所引致的問題。然而港澳的投資者已排除這些憂慮，因為港澳兩地的企業家懂得把握每一個良機。

憑藉與國內有一種感情和血緣的非正式關係，在某程度上取代了西方人必須以白紙黑字訂立的法律上的保護措施，因而來自港澳的投資者很早便在經濟特區和廣東省其他地區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因低成本的土地、廉價的勞動力以及提供原材料有利條件之便，更因對地區基本建設投資的增加（尤其是八十年代後期），均有助港澳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再次根植於鄰近的中國地區。

所以澳門加工業就業率下降根本不足為奇，九年間（1987-1996），該行業便流失了大約40%的工人，這個流失率在非紡織工業中更達66%。

粗略評估，可將這個時期分為兩個階段。

首個階段（1987-1991）的特點主要是非紡織工業就業下降，這個時期正值勞動密集型工業大量遷往中國，祇在澳門保留餘下的生產工序，主要是包裝、裝運及銷售等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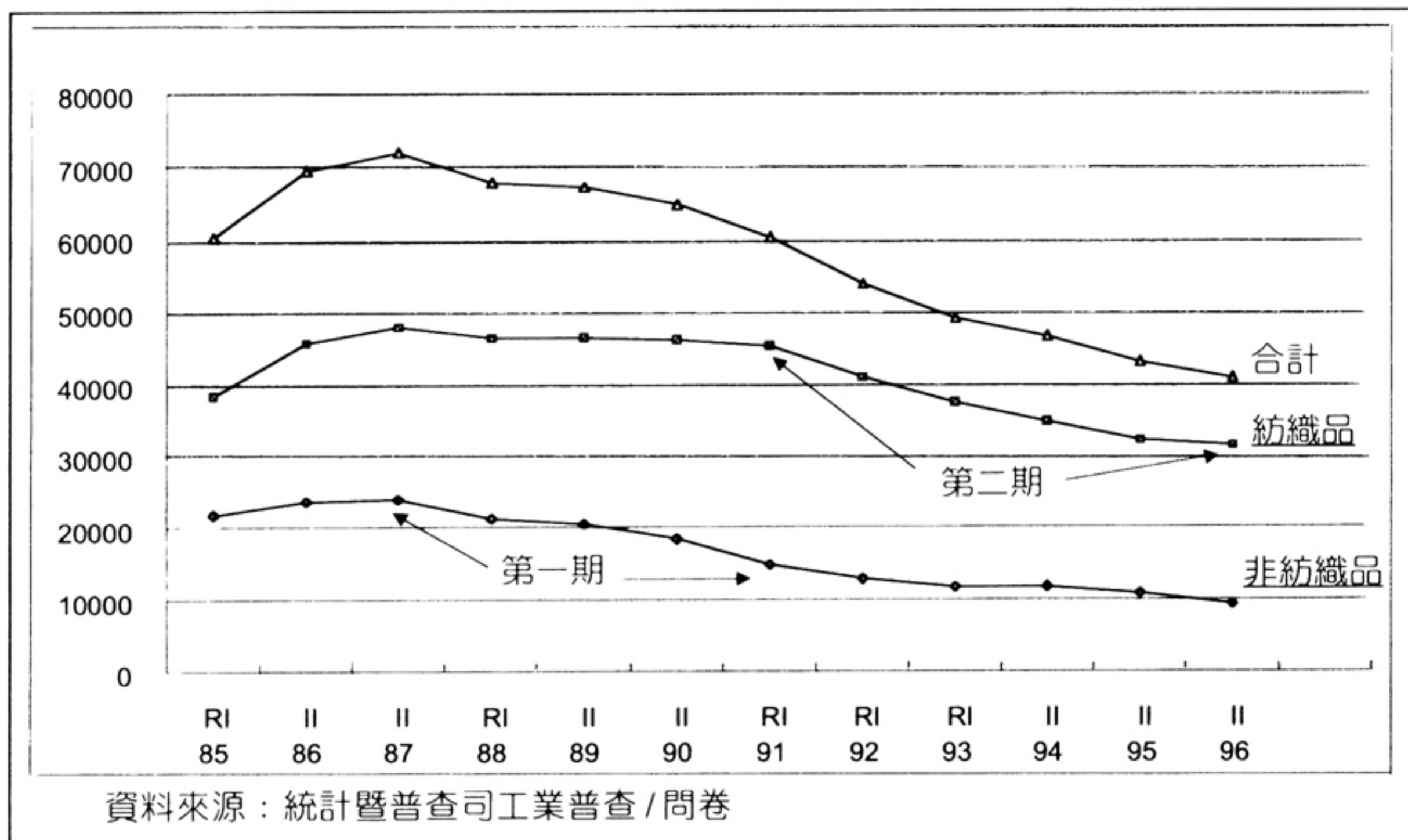
我們承認，製衣業為了要符合來源證的要求，很可能會聘用部分來自其他工業行業的勞動力，這樣，就業率就可以維持在一個相對較穩定的水平。

1991年，勞務輸出首次超過了貨物出口的價值，其中以非本地消費的博彩業佔相當可觀的比重，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今。

6. 雖然珠海在旅遊業範疇仍然推行一套具競爭性又相輔相成的政策，例如興建賽車跑道及舉辦一級方程式賽車，但澳門自1950年已開始舉辦澳門格蘭披士大賽車，數年後，並開始舉辦三級方程式大賽。

7. 北海、大連、福州、廣州、連雲港、南通、寧波、青島、秦皇島、上海、天津、溫州、煙台、湛江。

圖表三 澳門加工業的服務人員（1985-96）



第二階段是1991年至今，其間工業就業率急劇下降，因為仍有其他的非紡織品生產繼續轉移到中國以及因製衣業的就業率亦開始下滑所致。儘管已輸入中國外勞以及部分工序暫時移往中國，這種活動現時佔有重要的位置，幾乎可與澳門對中國出口活動的總數相比⁸。

雖然有這種改變，但製衣業仍是最大的僱主、生產商和工業出口商，1996年該行業工人佔61%，增長值在加工業所佔的比率接近59%。在本地區出口結構中，製衣業的重要性還可以由1997年這些製品在整個內部貨物的出口中所佔的極大比率（88%）得以證明。

但是，澳門的投資在第一階段便進入珠海經濟特區，不久便遍及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方。

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鄉鎮地區，國家對那裏的控制較為寬鬆，而且地方政府在建設和發展的決策上有較大的自主權（Ng M.K. 及 Tang W. S., 1997），這樣便為廣泛的投資帶來方便。

與此同時，中國的開放和現代化政策隨着上海浦東開發區的成立而繼續深化，遵循為沿海各城市和內陸各省所定的方向，開放長江沿岸的城市以吸引投資。

雖然中國報章公佈了投資的有關數據，然而澳門及香港的投資者以往至現在在中國投資的確切數據實難統計。

這樣，從1996/97年的《對外商貿及經濟關係年鑑》⁹中可以看出，1995年來自香港的投資是二百億美元，居第一位，同一時期澳門的投資為四億四千萬美元，在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之前，名列第八位。

8. 1997年澳門對中國的臨時出口——幾乎以紡織及半加工成衣產品為主——達一百二十七萬美元，可與包括國內出口及再出口的出口總額一百三十九萬美元相比。

9. 除相反的指示外，所有有關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均摘自1996/97及1997/98年的《中國對外貿易及經濟關係年鑑》。

1995年中國直接使用的投資來源

	金額（百萬美元）		金額（百萬美元）
香港	20,060	法國	287
台灣	3,162	意大利	263
日本	3,108	馬來西亞	259
美國	3,083	加拿大	257
新加坡	1,851	澳洲	233
南韓	1,043	荷蘭	114
英國	914	印尼	112
澳門	440	百慕達	109
德國	386	菲律賓	106
英屬處女島	304	其他	618
泰國	288	合計	37,520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貿易及經濟關係年鑑》

但亦應該謹慎分析這些數字，因為在這些數據中，中國直接利用的外資佔了很大部分，然而透過離岸企業在國內的再循環投資的數目難以顯示出來，這些企業亦享有給予外來投資的優惠，尤其是稅務優惠（EIU, 1997）。

最常被利用的投資再循環渠道是香港。根據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的資料顯示，雖然有資料指出1995年外來直接投資大約佔20%至40%¹⁰，即七十五億至一百五十億美元之間，但卻沒有關於國內資金再進入中國而享有給予外資優惠的可靠數據。

然而，透過香港投資的金額達到如此數目，即使最後扣除估計屬中國內地的投資，香港在投資於中國的資金排位中，即使不名列第一，也一定會排於前位。

同樣，不能說澳門實際上未佔較前的位置¹¹，即使澳門在1995年不能成為第八大投資者，但仍是該年在中國的第十五至第二十大投資者，儘管如此，對一個祇有二十一平方公里土地的地方來說，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儘管對現有的統計資料有適當的保留，但可清楚地強調在中國開放的頭幾年，香港和澳門的資金對南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了影響和起着引導作用，在那裏再現了一個具有共同特徵的經濟模式，換言之，是以出口工業為主，其中非技術性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紡織、鞋類、玩具等）佔較重要的位置。

10. 世界銀行在《China2020-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China Engaged》第一章第十頁第六號註解所引證的某些資料，近期約20%的流入資金係由國內出口及再入口的資金所組成。這樣，可有助刺激外來投資者（UNCTAD, 1995）。

11. 單以1995年為例，若果在澳門對中國直接投資中的20%或40%屬中國國內資金的話，本澳便躋身於第九或第十三位。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加上香港的一些情況，澳門現時正處於一個經濟轉型時期。雖然工業在生產結構中失去了重要性，所聘用的勞動力急劇下降，但某些作者（Tsang ShuKi, 1994）對這種轉變趨向認同，而且不認為這是一種結構的轉變。

Tsang ShuKi 指出由農業經濟過渡到工業經濟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先前佔優勢的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從而令剩餘的勞動力及資源轉向現代化工業。談到工業發展，農業機械化的引進為農業帶來裨益。至今，這種發展形成一種良性循環，促進了經濟發展。

“服務業在工業社會及後工業社會將可達致一定的平衡，日本就是一直被譽為是資訊與工業同步並進的典型。”

作者認為，香港和澳門的生產及就業標準的改變，反映出經濟方面有好轉的勢頭，對作者的這個觀點，有人執意贊同，但祇要仔細推敲，便會使人產生疑問。

事實上，如前所述，當港澳兩地企業家將生產重新轉移到中國時，他們對利用革新科技並沒有興趣，反而被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所吸引，這個過程絕對不能刺激技術改良。另外，Tsang ShuKi 又指出香港向中國提供的服務類型——這些服務亦應加上由澳門提供的服務¹²——是屬於慣常類型。

所以，無明顯蹟象顯示在港澳兩地所謂的經濟“結構轉型”中，工業及服務業能夠良性循環。

作者最後總結“結構轉型”的迅速蔓延，就如在地區經濟組織中資源比例的一次再分配。之前，香港及中國兩個地區完全沒有連繫，但很快便消除了妨礙生產及資本流通的障礙，建立了分工合作的一個新的模式，這一點在短時期內會為雙方帶來明顯的效益。但這情況所存在的風險是由於兩地的收益達到一定的數額，就不會感受到為實現長期效率而改善條件所需的真正結構轉型的壓力。

亦有人（Enright, Scott, Dodwell, 1997）認為，香港工業的衰落比實際更加徹底。一方面是由於部分行業過往是被列為工業範疇的，而一些副行業（商業化、生產計劃、設計、市場學等）一類的工業場所自生產線再次立足於中國後，便可能被列為服務業範疇。

除此之外，因生產力擴展到其他地方，特別是華南地區，使香港的成衣、玩具、某些電子產品及鐘錶等工業再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現今香港的工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盛。

作同一分析的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研究人員在報告中指出，雖然本地區的生產有所下降，香港近幾年的工業比例反而擴大了，恰如以下這段話所描述的：“Made by Hong Kong” has grown, even as “Made in Hong Kong” has declined (Berger 和 Lester, 1997)。

對於這些撰寫報告的人來說，工業衰退祇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不單祇是由於本地區以外的生產增加，更主要是由於工業與服務之間存有差異，但兩者間逐漸結合的一面卻被埋沒了。

12 這些係出口貿易的一些輔助及補充服務，如押匯、銷售、商務、出口資金、設計、品質及包裝管制等。

在資源方面，傳統上服務業是工業進程中主要的投資對象，而加工業則是服務生產革新的主要源頭。兩者的結合仍以產品方面較為明顯。一方面，對於今時今日的消費者來說，越來越趨向於以一系列的潛在特徵（設計、質素、創新、款式、交貨快）來衡量產品的價值，如這些特徵未融入產品中，則被視為服務。

由此可得出結論，界定工業與服務越來越複雜，從統計學概念上維持兩者之間的強烈差異更會造成兩種混淆的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導致幾乎肯定地降低對香港工業的實際規模及範圍的評估。第二種情況是掩蓋了香港自身的能力及潛力，即獨有工業潛力增長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這些討論是為更好地瞭解影響澳門投資環境的重要資料，這些影響是自八十年代末，因本地區的工業，尤其是因澳門經濟中的第三產業化的工序轉移到中國而造成的。

然而，要注意的是投資並非單向地由本地區進入中國。相反，近年來中國到澳門投資是公認的事實。澳門中國企業家協會（ACEM）最近（20 / 02 / 98《澳門日報》）公佈了目前中國在澳門的大型投資項目的有關數據：

- 本地區金融業佔60%；
- 保險業佔50%；
- 建築及不動產業佔80%；
- 出入口貿易方面佔30%；
- 旅遊業（不包括賭場及博彩業）佔50%。

已在協會登記的151個中資企業中有45個是與澳門或其他國家合資的企業。南光、南粵及珠光集團是駐澳的三大中資集團，第一個是與中國外貿及經濟合作部有關，第二個與廣東省政府有關，第三個是與珠海經濟特區市政府有關。

要強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在工業方面的投資數據並未公佈，其原因是除了博彩業外，這方面是該等企業在澳門投資最少的項目。此外，正如之前所分析，澳門工業出口是如何產生的，自然而然，該行業至今仍以本地資金或香港企業為主。

相反，中國企業在建築及地產業的投資佔極大的比重（80%）。當然，該行業在八十年代是以本地區及香港的資本為主穩步發展，滿足對住宅及工業設施需求的增長，然而在九十年代情況徹底改變了。九十年代在澳門的大量投資，正是中國經濟改革及政治開放的印證，其中大部分投入地產市場的雄厚資金均來自中國。

從某方面而言，本地區的地產市場（正如很多亞太地區城市及珠江三角洲地區一樣）本應是本地的問題且別具特色，但亦受到同一個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的規限。對地產業的密集型投資開始跨越地域及本地的邊界，迫使都市分析人員再評價具有本地特性的地產市場及城市發展的傳統概念（Yeung Yue Man, 1993）。

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但同時亦要為破壞環境而付出代價。

最具經濟規模的三角洲城市及企業在基礎建設方面進行了強烈的競爭，目的是吸引外資。三角洲現有的五個新機場¹³計劃，正顯示出競爭的劇烈以及對外關係方面的明確方向。與此同時，除了說明了當初忽略了為該區配備快捷的交通工具之外，更證明了該區缺乏道路網和鐵路網。（Ng M. K. 及 Tang W. S., 1997）

1989年，為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系統計劃¹⁴（Pearl River Delta Urban System Plan）獲得通過而試行協調三角洲的發展並未成功。直至最近的1995年，一項名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計劃（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Plan）才獲得通過。

現時，中國當局注意到不僅要透過香港和澳門來繼續促進三角洲與外地的連繫，同時亦要促進三角洲內部發展。據有些作者的意見，以上計劃是針對三大都市（廣州、深圳及珠海）的發展，並以它們作為其他中小型城市¹⁵的城市化走廊，透過大型的高速公路、鐵路及“資訊公路”的連繫，使細小城市在這些大都會的中間發展起來，從而該區將成為“龍頭”，藉着與世界經濟接軌而促進華南地區的發展。

據以上分析，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計劃表明中國近年在國家經濟改革及政治開放的政策下致力統一城市及地區的發展。

另一項值得關注的是，澳門不可能置身於該地區的連繫網絡之外，而這網絡成為其經濟求存的關鍵，成為促使本地區的個體及權力機關建議實施一系列工程的原因，這項建議的目的是要使澳門與中國、香港甚至外地建立新的連繫。

這些工程包括將廣珠鐵路及公路延伸至澳門；興建一座連接本地區與橫琴島的大橋；協助私人投資計劃，如在澳門、珠海及香港之間興建的橋樑，以改善與香港的連繫。對外溝通方面，有一私人公司計劃在路環以南對開七公里處建造一人工島，然後在島上興建深水港。為處理有關問題，且顧及到該等計劃是由澳門提出的，因此成立了中葡大型基建協調委員會（2/10/97《澳門論壇》）。

這些計劃的落實將為澳門再一次承擔中轉站的角色注入新的動力，雖然現在仍處於沿用過往的模式。既然從地理上已在一個最鄰近的地區，包括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內發展，地域的結合能為經濟的結合創造重要的契機，從而使運輸、通訊及能源三項邏輯向量得到發展。

另外，從當今來看，賣家、產品、買家、運輸工具及交易的財務條件的接觸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然而為了從這些過程收到效益，需要集中極大的能力及具高度專業性的技術。

因此，與香港增加連繫，使澳門具有一股競爭力，鄰埠地區已經具有這種競爭力，近年來更得以系統地改善。與此同時，鑑於實際情況和背景，鼓勵發展同樣的競爭力以及提升其他具有互補性的競爭力。

13. 廣州、香港（赤臘角）、澳門、深圳及珠海。

14. 根據 Ng Mee Kam及 Tang Wing Shing所述，祇有三角洲的城鄉才實施珠江三角洲城市系統計劃所定的措施，並估計對其本身的發展有利。

15. 除廣州、深圳及珠海外，三角洲內較重要的城市有東莞、中山、番禺及順德。地區計劃涉及五個問題——城市發展、環境、基建、經濟及社會發展等——但 Ng Mee Kam 及 Tang Wing Shing 的分析主要着重關於城市發展的問題。

二、中國——與世界經濟及政治合作

整體合作的步伐在八十年代中期逐步加快（擴展及加強國際商業、投資及財政關係），中國自1979年實施鄧小平提出的自由經濟計劃以來，開始逐步取消原來的計劃經濟方針，對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衡量經濟開放程度的方法之一，是以國內生產總值與外部貿易和直接外來投資的比率來衡量。據世界銀行最近的一項研究，在1975年至1979年，中國的外貿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0%，是120個受觀察的國家中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而在1990年至1994年，該數字上升到36%，使中國躍升至這些國家中的第三位（世界銀行，1997年）。

1979年中國實際上並沒有大量的外來投資，但在1990年至1994年，外來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3.5%，可以這樣說，在上述的國家中排在較前的第九位。

前述中國亦有向外投資（澳門，但主要是香港），1995年佔資產總值的2%，這使中國名列世界水平的第八位，並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的總輸出國。

今日，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不單在世界經濟中處於中堅地位，而且更是地區內一個越來越強盛的國家，這點可以從在最近的亞洲危機中，中國如何起着穩定的因素為例來證明。

中國經濟改革，由於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年底蘇聯的解體及東歐國家轉向市場經濟等原因發生了徹底的變化。這些變化促使中國在“商業外交”的基礎上重新描繪對國際關係的新藍圖，將大部分重點側重在經濟方面，一改冷戰時期軍政執權的局面。

反而言之，中國與其加強貿易及投資關係的那些國家（特別是美國、歐盟及日本），他們現正重新釐定對中國的策略。

1996年，中國的一些主要貿易夥伴，包括日本、美國、香港及歐盟，佔中國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二，假如再加上台灣及南韓，百分比就會上升至77%。

此外，在歐洲方面，德國在歐盟與中國的貿易總額中佔33%，其次是英國和意大利，各佔13%。

中國的這種外貿結構顯示出一種極度集中的情勢，使中國與一些主要的貿易夥伴之間出現緊張的局面，尤其是美國（近年出現貿易逆差及知識產權問題）、歐盟（多個反傾銷個案）及日本（輸入來自中國的紡織品），這只是所援引用的部分例子。

從某方面看，亦反映出與一些重要的國際貿易組織有關的貿易上存有困難的事實。中國於1980年便加入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等組織，其間仍在談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事宜，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7月中國（再次）正式提出加入關貿總協定的談判¹⁶，但在烏拉圭會議結束前仍未取得共識，至今仍在新的世界貿易組織中討論。

16. 中國為1948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簽署國，但已於1950年退出。

然而，1991年至1995年，與中國保持貿易關係的國家由173個增至225個。當然，有必要確保外貿數字的上升，藉此保障吸引足夠的外匯，使其經濟現代化政策得以延續下去，因此，自1991年起，中國就積極實施走向市場多元化的政策。

此政策令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距離拉近，但同時亦轉向一些較遠的東歐及拉丁美洲國家。

雖然這些國家在中國總體貿易數字中祇佔很少部分（2.3%），但中國與拉丁美洲的雙邊貿易自1990至1996年就增加了三倍，由二十三億美元上升至六十七億美元，巴西佔其中三分之一¹⁷，是中國與拉丁美洲的一個主要貿易夥伴。

中國近年亦加強與非洲的合作、投資及貿易關係¹⁸。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1996年出訪非洲六個國家¹⁹就是一個例證，所取得的成果是與每個國家簽定經濟及技術合作協議，這是一個新的開端。數月前，在就有關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所作的一次訪問中，當時的外貿及經濟合作部部長吳儀強調，中國需要對非洲及拉丁美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多元化的產品（10/2/98《南華早報》）。

儘管非洲大陸並未被中國視為一個重要市場，因為1997年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往來祇佔中國貿易總額的4%。其中，南非佔三分之一，然而，中國企業在非洲所作的投資正邁向所佔比重越來越顯著的一個新紀元。

因此，中國會在加強同非洲的貿易、經濟及合作等關係上盡量提供合作。

三、中國市場 —— 規模、進入市場的困難及潛力

中國與美國面積相若，而人口卻有十三億，是美國的五倍，佔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個比例近二十五年來一直保持穩定。

從數字而言，相等於美國、巴西、俄羅斯、日本、墨西哥、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西班牙、加拿大、澳洲、比利時及瑞士多國人口的總和（M. Weidenbaum和S. Hughes, 1996），從經濟角度而言，這個人口數字應約減至三億五千萬。

因為至1995年年底，祇有三億四千三百萬人個人年均收入達到516美元的水平，農村地區的個人年均收入祇有200美元，這種收入水平根本不能購買進口消費品（EIU, 1997）。

除此之外，儘管中國當局近年施行徹底的經濟改革，但現行的貿易制度仍存有各種障礙，這些障礙一般是法律、規章、政策或措施等方面，藉此保護或人為刺激與外資競爭的內部產業產品。

17 1996年中國輸往巴西的貨品約達七百六十萬美元，而從巴西輸入中國的貨品約達一千五百萬美元，反映出這是有利於巴西的貿易逆差。

18. 另一個促使中國與非洲發展外交的原因是，至1996年8月，三十個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中，有九個為非洲國家，而中國正努力避免這項數字的增長。（Yasuo Onishi, IDE, Spot Survey –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China's Dilemma,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Tokyo, 1997）。

19. 埃及、幾內亞、埃塞俄比亞、馬里、納米比亞、津巴布韋。

雖然不久前以及在多數情況下，中國對入口貨品仍然徵收極高的關稅，但中國為了履行雙邊協議或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直努力向減稅方面邁進。在1995年最惠國待遇稅率達到150%，而關稅平均值處於35%以上，但自1996年4月，大幅降低4000個項目的關稅，1996年平均關稅為23%，1997年則為17%。

儘管如此，在最近為加入世貿的談判中，中國又大幅調低關稅，由現時平均17%下調至2005年的10%，並會在同一時間撤銷所有配額。

然而，這水平可能仍相對較高，未能預計的關稅執行情況，成為企業對中國市場出入口的困難。

事實上，同一產品應繳的關稅可根據不同的情況，如該產品是否被選為獲減低甚至豁免關稅或因進口地點的不同而有所分別。在不同的進口地點也有不同的關稅標準。另外，決定徵收或豁免所規定的稅項，特別是關稅，很多時是以企業與海關部門的談判結果來作彈性處理。

進口到中國的產品除了關稅外還可能受增值稅或其他稅項所制約。這些稅項，基本上從入口貨品或者是內部產品來徵收，但這些稅項並沒有統一標準，因為稅率亦可以透過協商來訂定。

雖然目前已採取一些方法來豁免稅項，但中國仍有很多雙重或多重的非關稅屏障，如配額、入口證及其他行政措施，藉此控制入口貨品數額，從而促進其工業及貿易政策。

關於這些非關稅措施所許可的入口水平，是中央政府、部級、國家機關及出入口企業經過共同反覆磋商來決定的。如此，種種入口證制度的要求就成為進口到中國市場的一些產品的障礙。

進入中國市場的另一個障礙，在於中國獲准進行外貿的實體的種類和數量，外國企業祇准輸入生產所需的物料。在這方面，1979年祇有14家公營企業獲准進行對外貿易，而至今已有超過12000家了，由此可見中國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如上所述，中國在這幾年內為外資創造多種優惠條件，現時既有共同之處，亦有針對不同地方的特別情況加以分別對待，例如經濟特區、經濟及科技發展區、沿海開放城市、開放區（如珠江三角洲）、高新科技區及關稅制度倉庫區 / 免稅區，這樣，決定在甚麼地方投資便成為困難和複雜的問題。

外商要進入中國仍受到國家、地區及地方的繁冗的制度所限制。外商面對的主要障礙是一些表面專橫的法律、條例及規章；外匯儲備短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足；產品控制；與國有企業的待遇不平等以及缺乏解決分歧的機制。除此之外，在投資條件或者貿易方面缺乏透明度，使外商得不到這些規章的資料，甚至很多時這些規章尚未公佈，或者不同的地區在執行中有所改變。

由於中國對服務業市場仍有一些限制（通常外資企業獲得選擇性的准照及在某一特定地區內才可提供服務），中國亦表現出有意開放市場，且隨時以“試驗”方式開始實行。

這只是來自中國現行的貿易及投資政策以及在打入該市場時所遇到的其中一些困難的例子，這是由於其經濟發展有着本身的特性，但從一些重點來看，這些特性仍未能配合實際的市場經濟。

另一方面，沒有人能肯定中國在未來數年甚或數月會發生甚麼事情。近期的亞洲危機加上經濟增長放緩，以及經過九十年代初期經濟飆升而實施了四年的緊縮政策，中國經濟情況在短期內可能呈現負面的現象，所以是否如今年五月第一週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預測的那樣，目前正處於新的增長放緩期或是經濟衰退期，還是難以估計的。

在實行預期改革時出現停頓甚或倒退，不但會對中國經濟，甚或對全球經濟均會產生負面影響。然而，很明顯中國領導層對貫徹改革所表示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儘管面對困難，然而所訂定的主要目標是不會改變的。

因此，第九個五年計劃²⁰（1996 - 2001）訂下了由“計劃經濟”過渡到“社會市場經濟”的一系列指導方針。在投資層面，除了訂定的一些優先項目外，還制定了改善投資條件的方針。直至最近的四月，由朱鎔基宣佈的新的政府計劃，決定改革投資制度，這是一種由行政主導程序向市場規律程序的轉變。

四、澳門可能扮演的角色

中國於1978年宣佈開放市場後，西方國家便關注着這個擁有數以億計消費者的具有潛能的市場，但卻對優先建立（尤其是經濟特區內）的出口工業失望。如今，面對數年前還未為人知及無法想象的貿易新機會，他們正加緊在經濟方面的聯繫。

然而，鑑於中國各省的政府及企業在投資及外貿方面正取得較大的自治權，一些可與中國競爭的國家已覺悟到必須注意這種新實情所帶來的影響及機會。

可見的是，（尤其在九十年代）香港和澳門與源自其他地區的投資相結合，生產程序的延伸使廣東省發展成為較發達的省份之一，並成為國內人均收入較高的省份。

基此，中國南方正由一個以出口為主的經濟演變為一個擴大消費的地區。即是說正處於由出口經濟向具中等購買力層面轉變的過渡期。

不論從投資活力方面還是私人消費力的增加方面，都反映出國內需求的發展很迅速，對一部分被視為必需品的入口貨品需求量很大，而香港卻正好能滿足這種需求，因此便擔當起商業中介及所需服務的供應地的角色。

面對上述演變，是否亦可以期望澳門在葡語國家與中國尤其是與南方，在經濟及商業連繫的問題上擔當同樣的角色？

澳門在葡萄牙人登陸四百多年後，主權即將回歸中國，並在不久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按照中、葡雙方政府於1987年4月簽訂的《聯合聲明》中所訂定的“一國兩制”的原則，將在獨立的立法權及司法權上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20. 透過參與六個主要範圍：國營企業、銀行體制、監察體制、商業、價格及市場，以求集中改革國營企業。

根據（1993年）與憲法具相似效力的《基本法》，除了外交關係及國防事務這兩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各個方面將維持不變。資本主義制度及現時的生活方式在主權移交後的五十年內基本維持不變。

至於經濟及立法體制方面的有關規定，須強調的是，會透過私人及企業物業法保護來自特區以外的投資；維持一個獨立的監察制度，以及延續能確保財產及資金自由流動的開放經濟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將負責在經濟、監察、貨幣及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並維持自由貿易港地位及作為單獨的關稅地區。此外還可加入國際組織及國際經貿協定等。

中國開放的歷程以及之後逐漸走上軌道並成為世界強國，促使中國必須與其他包括葡萄牙在內的歐盟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投資及合作等方面拉近關係，並使之走向多元化，其中亦包括與發展中國家建立關係，如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因這兩處均有葡語國家。

至於貿易方面，現時已不能祇着眼於貨物交換和徵收海關關稅等事宜。當今的國際貿易已變得十分複雜，兼且涉及經濟範疇中有關知識產權、投資及交換服務等多方面事項。

除了或有的雙邊貿易協議外，現今的國際貿易乃是由世界大多數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內所承諾遵守的一系列多邊貿易協議所規範。

基此，在一個漸趨由交流過程主導的世界裏，語言及文化方面的問題似乎已佔有越來越顯著的重要地位。

對中國甚至東亞的一些在語言及文化體制上與其他葡語國家相同的地區而言，澳門是獨一無二的地方，且在結構性方面佔優勢（自由貿易港、在對外貿易關係中享有運輸自治權），具有最好的與夥伴合作的條件，即使在主權轉移之後，亦可成為連接葡語國家與中國南方的天然的溝通橋樑及紐帶。

所得出的結論是，一方面是有利於中國的，使其在國內擁有便於與外界建立關係的合資公司。另一方面，對澳門來說，為葡語國家擔當有關的職務，可創造一些能更好地保持其獨特身份的條件。

自1992年起，澳門維持與歐盟簽訂的非優惠貿易及合作協議，作為歐盟成員，澳門可否在上述的聯繫中擔當一個角色，取決於歐盟及葡萄牙，甚至取決於中國、非洲及拉丁美洲與歐洲企業和葡國企業的策略性目標。

歐盟已於三月二十五日在部長會議中通過一項對中國的新策略（與中國建立全面的合作夥伴關係）協議，將透過召開由國家元首及總理出席的週年高峰會議，提高及加強雙邊政治對話地位，並將此高峰會視為同美國、日本及俄羅斯等高峰會議同等的程度。

歐盟與中國的關係演變，從某方面顯露出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改變反應較為遲鈍，正如本文所述，直至1994年，雙邊政治對話只限於在聯合國全體會議外圍舉行的週年短暫會議上。結果，歐洲與中國在欠缺共通政策的情況下，便展開了雙邊談判策略，尤以德國為最（其較先實施這項行動）。然而，自1995年開始，歐洲

人對中國的態度似乎有了改變，歐盟採取一項計劃²¹，就是擬定一套整體政策以便能與中國長期發展關係。

現時所宣揚的新策略，一方面凝聚了歐盟的力量，跟進及回應中國自 1995 年開始因經濟及政策的改變而帶來的競爭。另一方面，歐盟可展現出其本身在全球經濟中的力量。此外，本文還強調，由於（歐洲）單一貨幣的引入、向東方的擴展及《荷蘭條約》的出現，現今的歐盟自認有新的方法鞏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至於葡萄牙，有意強調的是，隨着去年十二月一份新的領事館規則的公佈而邁出某些重要步伐。該規則除賦予各葡國領事館外交代表的職能外，還再一次賦予其參與文化及經濟活動的職能，並給予有關領事重要的地位。該法規在葡國駐澳門領事館設立前夕開始生效，當中包括了“葡人社群之間的合作”及“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合作”的象徵，被視為是一場小小的“法律革命”²²。（Carlos Forta, 1998）

如果說上述種種對該策略的發展來說是正面因素的話，那麼，其他負面因素更值得留意，例如澳門及整個東方地區葡資企業較少，若不採取適當的實質性的援助計劃，是難以扭轉這種情況的，因為其他國家正在進行這些工作。

援引證美國一太平洋貿易及投資政策委員會的一份報告²³中的一些成功的例子，例如在新加坡建立的“德國中心”，可協助一些中、小型企業進入亞太市場，美國就是借鑑這個例子來促進與亞太區的貿易及投資關係。“德國中心”為企業家提供機會，避免在亞太區進行貿易時在運作過程中的花費，此外，還向他們提供了多項服務，當中包括免費提供寫字樓、提供基本的輔助服務及翻譯服務等等。

首間這樣的中心對推展德國中、小型企業在亞太區內的活動極見成效，因此已在上海興建了第二間中心，並計劃在南韓、北京及河內等地興建該類型中心。

有關策略中被視為稍薄弱的方面，已考慮到在公共行政內加入（幾乎）專有的葡人社群，（現在其重要性正減弱，將來會更甚）以及考慮到缺乏葡國漢學家等問題。

三月份，東方基金會的行政官員 João de Deus Ramos，在布拉格出席中國作家作品葡語版的發行儀式上表示：“雖然葡萄牙人在中國已有四個多世紀，但對中國文化，不論是知識方面或是宣傳方面，葡萄牙人卻落在歐洲之末”，但事實上“澳門出現了說漢語及認識中國的人，言外之意即葡國人其實一向都非常熟悉中國。”（Jornal de Macau, 4/3/98）。

21. 這個計劃先於 1994 年歐盟所採用的“面對亞洲的新策略”，其中，在全球經濟一文內確認亞洲的重要性在不斷增強，建議透過與亞洲國家在財政輔助、合作、商貿關係及組織等方面建立平等的關係，以改變歐盟的態度。透過由國家首長和總理出席的高峰會建立歐盟與亞洲的長期對話。

22. 參閱葡國駐澳門總領事館籌設辦公室主任、外交官員 Carlos Frota 先生 98 年 1 月 23 日在《句號報》發表的《葡國領事館新規條——遲來的改革》。

23. “Building American 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 U.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United States – Pacif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Wash., 1997)。

最後，在非洲及拉丁美洲，除了與其有着歷史和文化的淵源外，葡國與這兩個洲的葡語國家建立了貿易及廣泛的投資關係的基礎。至於澳門，現時不祇是與葡語國家建立主要的經濟關係。

如前所述，在澳門的投資主要源自中國及香港，而主要與美國（26%）、歐盟（23%）、中國（17%）及香港（16%）建立貿易關係，總括來說，1997年澳門的總貿易約為82%。

在歐盟國家中，與葡國的貿易關係祇佔很少比例²⁴（1997年佔澳門總貿易的0.6%），這個數字儘管對其他歐盟國家來說是微不足道，但對葡國的貿易而言卻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澳門的總出口主要流向美國及歐盟²⁵，總括來說，1997年兩地吸納了80%的本地區外銷貨品；入口貨品主要來源為亞太區，尤以中國、香港、日本及台灣為多²⁶，這明確顯示出澳門經濟一體化的標準。

還需提及的是，隨着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事實上已呈現了一種增加擴大經濟空間的趨勢，例如：新西蘭及澳洲自由貿易地區（NAFTA）、歐洲聯盟（UE）、南部市場組織（MERCOSUL）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等。此外，由於地方色彩主義的趨勢，中國在經濟方面出現一些“大中國”的防禦者。所謂的“大中國”係由中國、台灣、香港及澳門（亦有人將新加坡包括在內）的經濟所組成。

無論如何，這種新趨勢可以符合一些國家的需求，他們可以透過跨地域的合作，解決一些不能獨力面對的、極為複雜的問題。同時，亦反映在這些國家為保護其本身的國內市場的勢力，形成了一些對立的商業集團。

現時這方面的主要問題是，在兩種勢力中，哪一種勢力將會成功，即是說地方色彩主義僅僅是祇為着其本身的目的，抑或是作為走向未來世界的一種手段²⁷。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關鍵，尤其對那些如澳門這樣細小的地區而言，事實上，因為這些集團的吸引力十分強大，而且很難避免他們之間可能產生的相互吸引。

因此，澳門以官式身份申請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是正確的²⁸。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有利如澳門為創會成員之一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經濟組織及多邊貿易外，還可有利本地區與亞太區的經濟合作，但根據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建議，祇有基於開放的地方色彩主義才會有益。

24. 1997年葡萄牙吸納了澳門總出口的0.2%，而向澳門供應的貨品，佔本地總入口的1%。

25. 1997年主要的出口市場為美國（45%）、歐盟（33%）、香港（8%）及中國（6%）。

26. 1997年澳門入口貨品的主要來源地是中國（29%）、香港（25%）、歐盟（12%）、日本（9%）、台灣（8%）及美國（6%）。對澳門而言，因其中介角色的關係，源自香港的入口貨品是被高估的。

27. 首次就該主題的論述載於經濟司司長的《Macau in Transition: Economic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Contexts — Official Perspective》內，並於1991年10月8日至11日在澳門舉行的ADIPA（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一般會議上發表。

28. 澳門透過葡國於1993年3月遞交以官式身份申請加入亞太經濟貿易合作組織的申請書。

對澳門的商家而言，由於現時的經濟及貿易關係以及大部分均為中國人，因此接近亞太區是很自然的事。與此同時，亦有利於接近其他東南亞地區，因為在這些地方，華人社群眾多，預計與他們建立貿易及投資關係比與其他地方建立這種關係較為容易。

可注意的是，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菲律賓等地華裔企業佔這些國家私人企業的70%，在越南及澳洲等地起到了越來越大的影響作用。（M. Weidenbaum和S. Hughes, 1996）。

五、總結

小型經濟的運作邏輯，例如澳門的運作邏輯，完全是對外開放的，由不受控制的機制及限制深深地制約，因此，須具有能迅速靈活作出內部調整的能力，變所有機會為資本，或對外部變化作出應變。

基此，澳門不可以被動地坐等外來的貿易及投資。

另一方面，澳門必須加強對亞太區經濟的認識，尤其洞察中國的經濟。澳門政府於1990年在一份研究書內提到，由於Mckinsey & Company Inc. 公司意識到上述問題而提出建議，正如中國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Lam Mu先生在當地報章發表的一篇文章²⁹中所述：“建立關於中國市場資訊部門的原因，是向所有欲到中國投資的外國投資者提供各種不同的服務。”由於澳門企業於轉移到中國內地設置廠房的過程中取得的經驗，為求實現這個計劃，澳門必須具有更佳的說服力，力求具備更多的條件，使其他國家的企業增加對澳門的貿易及投資的機會。包括葡語國家的這些企業，他們欲在亞太區建立基地，或透過該區經商，必須着眼於澳門，不僅將之視為一個出口的大門，同時還應將之作為進入中國南方及周邊地區的門戶。

為求成效，企業家在選址時，往往會衡量一系列因素。在前指的研究書內及向一些跨國公司作出調查後，“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按照其重要性排列如下：

- 市場就近與否；
- 資源的臨近性；
- 為外派人員安排優越的住所；
- 當地官僚主義作風；
- 環境狀況；
- 有具代表性的外國人社群；
- 外派人員子女的教育問題。

29 請參閱中國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經濟碩士Lam Mu先生1991年8月23日刊登於《澳門貿易》經濟欄的文章。

毫無疑問，不論對華南市場還是對與亞太區有關的市場而言，澳門具備了兩項較重要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從澳門，香港亦一樣，只需飛行五個小時便可去到半個世界的不同地方（Enright, Scott e Dodwell, 1997）。

澳門必須集中力量改善行政的資源——客現地反省現在的行政架構、運作、及精神是否適合現時的情況——此外，着力保持現有的葡國特色以吸引外資，而且，澳門必須建立提供予外來投資者子女的教育條件。

此外，澳門還需改善與亞太區的經濟往來，尤其該區的地區組織正處於發展及整合的過程中。

總括來說，繼續發展澳門的這項基本目標不但非常取決於鄰近地方的經濟發展，而且還須取決於是否具備全球化特徵的國際環境。此外，還需保持其獨特的身份。可以肯定，這一切將成為澳門在二十一世紀初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參考書目

Berger, Suzanne 及 Lester, Richard K. et al., *Made by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 — Winners and losers* (Hong Kong 1997) 。

由黃漢強編輯，1998年於澳門華僑日報刊登之 *Economy of Macau*, Chapter II “*Industry*” 。

Enright, Michael J., Scott, Edith E. e Dodwell, David, *The Hong Kong Advanta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Feitor, Renato, “Macau's Modern economy”, in R.D.Cremer,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Hong Kong, API Press Ltd., 1991) 。

Ng, Mee Kam 及 Tang, Wing sh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System Plan — An Analysis*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

Shum, K.K. 及 Sigel, L.T., “Managerial Reform” in Y.C. Jao and S.K. Leung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 Polic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Tsang Shu ki, *Hong Kong's Economic Prospect in a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 speculative Essay*,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School of Business, Business Research Centre, Papers on China Series, CP94004, 1994) 。

Vogel, Ezra F.,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Weidenbaum, Murray e Hughes, Samuel, *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 (N.Y., The Free Press, 1996) 。

World Bank, *China 2020—China Engaged,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 。

Yeung, Yue man, *Pacific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 Geograph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Shatin, N.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

